

# 辛亥革命再思考

丁 健, 张华腾

(陕西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 西安 710062)

**摘要:**辛亥革命史研究要进一步深入,就必须得对其进行冷思考。循着这一思路,本文拟对辛亥革命与君主专制制度的废除、辛亥革命与后来军阀割据的关系以及辛亥革命结局的表述,提出一些看法和见解。本文认为,辛亥革命在废除封建君主专制政体上所发挥的作用是有限的,且某种程度上加剧了后来的军阀割据;史学界对辛亥革命结局的多歧性表述,是有深刻历史根源和社会根源的,其中让位说有其自身的局限性,其他诸说也大多忽略了袁世凯与清廷的因素,应该对其进行重新审视。当然,之所以作如此思考,并非有意否定辛亥革命的伟大历史意义,而是希望有助于辛亥革命史研究的向前推进。

**关键词:**辛亥革命;君主专制;军阀割据;袁世凯;孙中山

**中图分类号:**K25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5315(2011)01-0164-09

辛亥革命史研究,曾经很热,成果也很丰富,但近几年逐渐显得沉寂,一方面是因为我们对其研究已经很深,起点已经很高,做进一步研究似有难度;另一方面与我们分析研究的框架不能说没有关系。回顾辛亥革命史研究的历程,不难发现,“革命史观”、“孙中山中心观”占有很大的比重,而对革命的对立面如清政府、袁世凯、地方官僚等的研究颇为不足,此外对辛亥革命所产生的负面影响不是避而不谈就是略谈轻谈<sup>①</sup>。发挥历史的借鉴作用,还是需要静下心来对之进行冷静思考,人云亦云不会出好成果。笔者本着对辛亥革命史研究认真负责的态度,就辛亥革命史研究中的相关问题提出自己的一些粗浅看法和见解,并非有意否定辛亥革命的伟大历史意义,而是希望有助于辛亥革命史研究向前推进。不足之处,敬请方家批评指正。

## 一 辛亥革命与君主专制制度的废除

众所周知,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的灭亡,是通过辛

亥革命完成的。这不容质疑。但如果把君主专制制度的灭亡完全归功于辛亥革命,则有夸大之嫌,也不符合历史事实。

(一)君主专制在近代的消亡具有历史的必然性

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在中国存在长达两千多年之久,前期其能适应社会发展,并促进了社会进步,但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后期逐渐成为社会进步的障碍,特别是鸦片战争以后,其腐朽性进一步突出地表现出来,外不能抵御西方列强的入侵,内不能处理好复杂的国内局势,而且其存在的条件也逐渐丧失,因而君主专制制度在中国的消亡有一定的必然性。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 经济基础不断遭到破坏。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既是封建生产方式的深厚基础,又是专制政体赖以存在的物质条件。鸦片战争以后,这种曾经具有极强适应性的经济形态,在面对西方廉价商品的倾销时,特别是在布匹和

收稿日期:2010-07-23

作者简介:丁健(1978—),男,河南太康人,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北洋集团及清末民初社会转型;张华腾(1955—),男,河南安阳人,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北洋集团、晚清史、中华民国史等。

一些日常用品上,根本无法与先进的生产力相抗衡,所以一些手工业不断遭到破坏,同时农业也被纳入资本主义世界市场,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逐渐解体。而这些新因素的出现,为资本主义经济方式的产生和发展创造了条件。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外国资本主义对于中国的社会经济起了很大的分解作用,……不仅对中国封建经济的基础起了解体作用,同时又给中国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造成了某些客观的条件和可能。”<sup>[1]588-589</sup>反过来,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又进一步冲击和动摇了自给自足的封建经济基础。

2. 阶级基础逐渐缩小和离心。封建官僚体系,无疑是君主专制制度的阶级统治基础。中央强大时,政府能够控制其庞大的官僚体系,而自从西方列强打破中国的锁国局面以来,清政府积贫积弱,逐渐形成“外重内轻”的局面,各地督抚的作用越来越大,无论改革,还是对外交涉,清政府都不能忽视他们的声音,以至于后来地方督抚敢公然叫板中央。八国联军侵华期间,清政府向八国宣战,地方督抚袁世凯、张之洞、刘坤一却大搞“东南互保”。在清末新政期间,岑春煊、陈夔龙、锡良公然向中央政府提出要权。四川保路运动发生后,清政府命岑春煊前去处理,岑称病不出,直接抗命。关于此事,时人是这样记述的:“已命端方,复起岑春煊,又寄谕滇督李经羲援川,李以不能离滇辞;旋又寄谕陕抚钱能训援川,钱以栈道不便行军辞;又谕粤张鸣岐分兵援川,张以粤乱方棘辞。”<sup>[2]548</sup>由此可见,清君主的权威已经不能正常施行了。另外,由于敷衍立宪,炮制“皇族内阁”,不仅引起地方督抚和士绅的不满,而且也加速了立宪派的离心倾向,清政府变得完全孤立了。所以,武昌起义之后,局面失控,一发而不可收拾。

3. 思想基础不断遭受冲击而动摇。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皇帝所宣扬的“君权神授”、“万世一系”思想不断遭到质疑。因为中国老是战败,而且要割地赔款,威信扫地。君权受到外来挑战时的窘况,一次是咸丰帝逃往河北,一次是慈禧携光绪逃往西安。这不仅在一般士人心中形成极大的冲击波,就是皇族本身也会对皇权的至高无上感到尴尬。此外,面对外敌入侵,国势日衰,国人不停地探索御侮强国之路,思想不断得到解放。由于救国愿望迫切,先进的知识分子也不断地转换思路,他们发现,中国发展最大的障碍就是政体,所以要求政治体制改革的呼

声越来越高,先前的以儒家为代表的封建纲常礼教自然不断遭到冲击和受到质疑。特别是后来的立宪派和革命派的鼓噪与宣传,一个主张君主立宪,一个主张民主共和,更是大大冲击了君主专制制度所赖以存在的思想基础。

(二)清朝统治者也为君主专制制度的废除做出了“贡献”

清末新政期间,清廷派员出国学习,并提出仿行预备立宪,尽管政治上的改革进展缓慢,但也在进行,而且还是统治者自己推行,具有一定的进步性。有人认为这是清统治者不得不为,但清政府作为了却是客观事实。其实,这时政体已经不完全是君主专制了。张海鹏先生主笔的《20世纪的中国·政坛风云卷》就认为:新政的“某些措施已经触动了清朝统治的根本,如在政治上宣布预备立宪,在中央设资政院,在各省设咨议局,扩大了民意表达。”<sup>[3]24-43</sup>侯宜杰先生也指出:“单纯的封建专制制度已不存在,民主政治及有关法律有些在试行,有些在准备和确立之中,整个政治制度正在向资本主义近代化演变迈进。”<sup>[4]574</sup>再说武昌起义后,清统治者也没有固守王朝之道,而是同意让国。

总之,武昌起义爆发前,君主专制就已经名存实亡了,辛亥革命则是连名义上的君主制也给废除了。此外,先进的知识分子、立宪派、革命派,甚至袁世凯在这方面也起了很大的作用。所以,我们不能简单地把君主专制制度推翻的功劳完全归结为辛亥革命。

## 二 辛亥革命与后来的军阀割据

以往我们提及袁世凯政府崩溃后的军阀割据时,首先就是拿北洋军阀说项,拿袁世凯论证,甚至把这一时期称为北洋军阀统治时期,立场观点极其鲜明。这不能说错,实则是惯性思维使然。殊不知,惯称的北洋军阀(已经有人对这一称谓提出质疑)<sup>[5]</sup>也是在辛亥革命中进一步发展和壮大起来的。如果我们静下心来仔细分析,不难发现,辛亥革命与后来的军阀割据的确有很大关系。

首先,辛亥革命进一步刺激了地方势力的膨胀。辛亥革命之前,由于中央集权的削弱,地方势力已经形成,并且其权力有不断扩大之势。刘伟先生指出:“晚清地方主义的代表力量是两个:地方督抚和地方绅士,而他们联系的加强和联合,是地方主义形成的标志。19世纪60年代以后,地方督抚通过编练湘

军、淮军,通过就地筹款,逐步取得了地方军事、财政权力,依此为基点,又进一步扩大了用人、司法、交涉等权力。这种权力的扩大带来了两方面重要影响:一是督抚对朝廷决策的影响力大大增强。中央对于重要事件均征询于督抚,而各省督抚向中央所提建议‘每每立见施行’;反过来,当廷臣条奏饬部之件交督抚酌议时则‘空言搪塞’,省的独立性大大增强。二是省的地方利益凸现,出现了省与中央的利益冲突。这种冲突特别表现在与中央争夺财源上,各省欠缴京饷,提留关税等事比比皆是。与此同时,省与省之间的摩擦和利益矛盾也开始产生。”<sup>[6]381</sup>那时,尽管地方势力与权力不断扩大,影响日深,但还没有发生过地方挟权与中央相抗衡的事件,名义上的统一仍在。可辛亥革命爆发后,各省先后光复,出现了许多都督。黎元洪是第一个都督,然后各省都有都督,自己出来独立、起义。据陈旭麓先生初步梳理,“从武昌起义到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各地先后称都督的有一百几十个。有的一省有好几个”<sup>[7]15-16</sup>。这大大刺激了地方势力野心膨胀,并各自为政,俨然“独立王国”。

其次,辛亥革命后新的统一没有完全建立起来,而且时间短暂。辛亥革命后,尽管南北妥协,建立了统一的政府,但其中矛盾重重。地方势力借口民主共和,利用国内政局不稳的条件,扩大自己的军事权和财政权,有一些后来转化为军阀。至于原因,陈旭麓先生认为:“因为旧的统一破坏了,新的统一又没有建立起来。所以,在辛亥前后袁世凯的北洋军和武昌起义后的某些都督,形成了后来割据混战的军阀力量。”<sup>[7]15-16</sup>当时,袁世凯利用自己的权威尽管表面上还能维持统一的局面,但在统一的表象下,仍然大量存在地方势力对抗中央的事件,比如江西李烈钧反对任命民政长事件、二次革命、地方税和国税划分上的矛盾与分歧等等。而袁世凯死后,这种局面也不能维持了,取而代之便是军阀割据混战。孙中山后来回忆这段历史时不无感慨地说:“夫去一满洲之专制,转生出无数强盗之专制,为毒之烈,较前尤甚。于是而民愈不聊生矣!”<sup>[8]358</sup>

最后,后来的一些军阀是在辛亥革命中成长起来的。如旧桂系陆荣廷,由于辛亥革命后广西地处边陲,交通闭塞,革命影响有限,陆成为事实上的统治者;袁世凯上台后,尽管他与袁的关系一直维持得很好,可事实上“袁世凯做了临时大总统,名义上统

治了全国,但广西一直处于半独立状态”<sup>[9]133</sup>。又如粤军阀龙济光,也是在辛亥革命中成长壮大的,与袁的关系也很近,并得到袁的拉拢,他“利用二次革命之机,占据广东,他与其他军阀一样,拥兵自雄,占地割据”<sup>[10]181</sup>。此外,还有云南的唐继尧、山西的阎锡山等等。值得一提的是,李宗仁并不把陆、龙、唐称为军阀,他似乎倾向只存有北洋军阀,割据也是北洋军阀造成的。他说:“谁知袁氏死后,北洋军阀的重心,随之解纽,逐渐形成各系——皖系、直系、奉系——军阀割据局面。南方各省的军事领袖如云南的唐继尧,广西的陆荣廷与广东的龙济光也互不相让。”<sup>[11]63</sup>辛亥革命后,袁世凯当政期间,成长起来的军阀就更多,如四川军阀、湘系军阀等等。

此外,有人认为是辛亥革命的不彻底导致了后来的军阀割据:“辛亥革命又是一次不彻底的民主革命,革命中他仅将统治中国的偶像清政府推翻,支持这个偶像的帝国主义与封建势力不仅没有触动,反而在革命后加强了它的力量,由帝国主义分裂割据政策与地方性农业经济所造成的中国分裂因素反因清政府的推翻和革命的失败公开化了,北洋军阀和各地大小军阀的分裂割据与混战局面就此形成。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辛亥革命的不彻底,才直接导致了近代军阀割据、混战的产生。”<sup>[12]31</sup>这种分析不无道理。

总之,认为辛亥革命与后来的军阀割据没有关系,我们不以为然;如果说是辛亥革命导致了后来的军阀割据,我们也不以为对;正确的态度是认真分析辛亥革命与后来军阀割据的关系,找出其中可供借鉴的经验。

### 三 辛亥革命结局表述的多歧性及其成说考

辛亥革命最终是以袁世凯当选南北统一的大总统为归宿,这是当时南北双方博弈的结果,可以说是各得其所<sup>[13]</sup>。这本来是很清楚的一个事实,但却有不同的表述,使简单的问题复杂起来。辛亥革命结局的表述之所以各有不同,这与当时国内局势的复杂有很大的关系。当然,后来历史的发展也多少对诸说的形成产生了影响,特别是袁世凯称帝一事,使人们对袁世凯产生了颠覆性的认识,使得先前对其的称赞一扫而光<sup>②</sup>,取而代之的是大奸大恶、一无是处的评价。长期以来,他成为政治清算的对象,成了为专制招魂的小丑,成了复辟帝制的代名词,结果严重影响到对辛亥革命结局的表述。就目前而言,关

于辛亥革命结局之表述,史学界主要存有如下五种观点。

(一)孙中山让位说。潜在含义是,本来临时大总统一职“非孙莫属”,但为了实现民主共和的理想,尽快促袁推翻清廷,孙中山以高风亮节的姿态,毫无权力意识地把民国大总统一席让给袁世凯。其实,让位一说,是置袁世凯于不义之始。

(二)袁世凯窃取说。顾名思义,袁世凯成为民国大总统不是光明正大获取的,而是通过极其卑鄙、残酷的手段,翻手为云、覆手为雨,一面玩弄清室之孤儿寡母、一面欺诈革命党人,阳议和、阴开战,并与帝国主义相勾结,结果窃取了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

(三)孙中山还位说。持此论者认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一席原本就属于袁世凯,后来革命党人与南方独立各省选举孙中山,只是革命形势发展需要一个头面人物主持政府,而袁世凯尚未来归、黄兴拟赴宁代黎元洪“暂任”大总统职权而尚未成行、孙中山却适时归国并主动要求承担大计等条件下的一个权宜之计,“虚临时总统之席以待袁君”的决定并未因此而具有根本性改变,孙中山的最终辞职荐袁仅是“践前言”,实为还位<sup>③</sup>。我们称之为“还位说”。

(四)袁世凯夺位上台说。此说认为,资产阶级革命党人本来就对帝国主义和袁世凯抱有幻想,袁世凯和帝国主义的威胁更增加了他们的妥协性,纷纷要求重开谈判,委曲求全,在革命党内妥协势力的胁迫下,孙中山被迫让步,表示只要清帝实行退位,宣布共和,则临时政府决不食言,即可正式宣布孙中山解职,以功以能,首推袁氏;结果袁氏促清帝退位有功,孙中山不得不辞职,袁世凯终于成功地夺得了辛亥革命的胜利成果,获得临时大总统一职<sup>[14]48</sup>。我们称之为“夺取说”。

(五)北洋集团、同盟会共建说。此说认为同盟会与北洋集团是甲午战争之后中国政坛上崛起的两支新的政治力量,从阶级对立的角度来说,这两支力量是互为对立的,同盟会以推翻清政府为志,北洋集团则以维护清政府的统治为责。从社会发展方面来看,二者都致力于社会的发展和改造,有许多共同的因素存在,只是方法和手段不同而已。武昌起义促使这两支政治力量携手结为政治同盟,共同推翻了清王朝,建立起统一的中华民国<sup>[15]</sup>。我们将此说称为“共建说”。

总之,不同的表述背后,有人们感情的寄托,也

受政治因素的影响,当然亦受论者阶级、立场、知识水平之制约,不能仅仅以对错论,因为各说都有其形成的历史背景,至少在一定时期内它是合理的。现在观之,也许各种成说已成历史陈迹,但是历史地考察各说仍是很有必要的。这种考察,不仅可以更深入地了解辛亥革命的复杂性,而且也可以洞知辛亥革命后人们是如何认识其结局的;既是对此问题的一个小结,同时也为将来做进一步的深入研究奠定了基础。

平心而论,在诸说中,影响最大的要数让位说,不仅形成此说的时间早,而且影响面广,又符合后来继任政权的国民党的意识形态。那么让位说是如何形成的呢?作为当事人的孙中山对此又是如何看待的呢?

武昌起义的爆发,出乎孙中山的意料,得知消息后,他辗转欧洲回国。其实,早在回国之前,孙中山就表示:“闻黎有请推袁之说,合宜亦善。总之,随宜推定,但求早巩国基。”<sup>[16]</sup>孙中山归国以后,先是致电袁世凯云:“暂时承乏,虚位以待。”<sup>[17]576</sup>1912年1月2日,随着和谈的波折,孙中山又致电袁世凯:“倘由君之力,不劳战争,达国民之志愿,保民族之调和,清室亦得安乐,一举数善,推功让能,自是公论。”<sup>[18]5</sup>希望袁世凯尽快赞同共和的心情溢于言表。16日,袁世凯被革命党炸弹袭击,孙中山得知这一消息时,心情十分紧张。据《字林西报》记载:“孙总统闻袁世凯遇险,亦甚殷忧,数问袁氏之安危,及闻及袁已安然脱生,始有喜色。”<sup>[19]</sup>孙中山赏识袁世凯到如此程度意味着什么?意味着袁世凯的安危已经关系到国家的安危。23日,孙中山在致伍廷芳的信中又明确指出:“盖推袁一事始终出於文之意思,系为以和平解决而达共和之目的”<sup>[18]38</sup>。在清帝退位后的第二天,孙中山就致电参议院推荐袁世凯为民国大总统:“今日本总统提出辞职,要求改选贤能。选举之事,原国民公权,本总统实无容喙之地。惟前使伍代表电北京,有约以清帝实行退位,袁世凯君宣布政见赞成共和,即当推让,提议于贵院,亦表同情。此次清帝逊位,南北统一,袁君之力实多,发表政见,更为绝对赞同,举为公仆,必能尽忠民国。且袁君富于经验,民国统一,赖有建设之才,故敢以私见荐于贵院。请为民国前途熟计,无失当选之人。”<sup>[20]</sup>紧接着,孙中山又致电袁世凯再次表露心迹:“民国确立,维持北方各部,统一南北,实惟公一

人是赖,谚云:英雄造时势,盖谓是也。文复何功,过蒙奖誉,曷胜愧汗,新旧交替,万机待举,遗大投艰,非公莫办。谨虚左位,以俟明哲,曷胜伫立翘望之至。”<sup>[21]</sup>由此看来,推袁是孙中山一贯的主张。但后来孙中山在回忆这段历史时很感慨地改口称“退让”,此时距辛亥革命之发生已近三年,他在致邓泽如的信中说:“局外人不察,多怪弟之退让,然弟不退让,则求今日假共和,犹未可得也,盖当时党人已大有争权夺利之思想,其势将不可压,弟恐生出自相残杀之战争,是以退让,以期风化当时,而听国民之自然进化也。”<sup>[22]</sup><sup>126</sup>总之,孙中山自始至终都没用过“让位”一词,倒是多次提及“推贤让能”、“退让”、“推功让能”。尽管孙中山没有使用过“让位”一词,但其也没有出来纠正“让位”一说。

为什么让位说会形成一种固化的成说?这可能 与当时人们对孙中山原话的意会有关。通过考证,最早持“让位说”的是《申报》。南北和谈期间,孙中山突然回国并被选为临时大总统后,袁世凯做了一系列似乎违反常态的举动,因而遭到诸多猜疑。关 乎此,《申报》有载:“此次临时政府公举孙文为大总 统,实至名归,原无多让,惟观袁世凯近日行动,颇露 醋意,缘此公平日夙有此种思想也,闻民军前有举袁 之说,近日孙亦有电让袁。”<sup>[23]</sup>这里也仅仅用到“让 袁”一词。接着,《申报》报端却屡用“让位”一词,结 果便引起一些人的强烈不满与攻击。《申报》不得不 载文澄清:“近一月来,盛传袁世凯将举为第一任总 统,此盖源於孙总统辞职让位之说,非本报所臆造, 亦非本报所鼓吹也。夫孙总统之所以宣言让位,无 非渴望共和之成立,南北之联合耳。故本报乐得而 载之,乃近日有人函诘本社,谓不应记载举袁之说, 且谓本社同人将于举袁之后,希得一官半职者,异 哉!洵如所言,则孙总统之宣言让位,岂将辞去总统 之高位,而思於袁世凯处谋得一官半职耶?今本社 敢告投函者,如君不以举袁为然,不妨电诘孙总统何 以倡为此说,若仅以谩骂之词,罗织之语,罪间接纪 载之本报,则误矣!”<sup>[24]</sup>这样一反驳不要紧,更加深 了人们对“孙中山让位说”的认识。当然,作为孙中 山本人肯定不会反对,因为此说蕴含着深刻的含义, 直接关系到袁世凯政权的合法性问题,同时也能表 现出孙中山不恋权栈的高风亮节。在北洋统治结束 后,国民党建立了政权,由于其继承的是孙中山先生 的衣钵,自然常常把让位说提升到政治的高度,并以

此作为清算袁世凯的一个有力工具。这样,在政治 的深刻影响下,让位说几乎成了不易之论。直到 20 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学术研究中,此说更是占据绝对 优势,但也有严谨的论者开始在“让位”二字上加上 引号。

让位说,看似一种历史的叙述,其威力并不能小 视,其对后来历史发展埋下了很大的隐患——即袁 世凯政权的合法性问题,既然是让与的,我们也有要 回的权利。这也成为日后讨伐袁世凯的一个合法借 口。结果,民初政局吵吵嚷嚷,争持不下,缺乏基本 的信任和共识,兵戈时而再起,政局动荡不安。即使 袁世凯死后,这种局面也一直在持续。

与让位说并行的是“窃取说”,此说在 20 世纪 80 年以前也很盛行,但随着改革开放,进一步解放 思想,相继有人对此提出质疑<sup>①</sup>。因为一面说孙中 山让位,一面又说袁世凯窃取,自相矛盾,逻辑混乱。 可就是这一相互抵触的说法,长期以来却相安无事, 真是奇怪!想来肯定有人早已认识到这一点,由于 种种顾虑,更主要是主流史观的影响,只好作罢,等 待后人来发掘。

窃取说的形成也有一个过程。最早称袁世凯为 “盗寇”的是《民立报》,在其《讨袁世凯(二)》中就有: “袁世凯,中华民国之盗寇也”<sup>[25]</sup>。这尽管是当时革 命党人反袁的一种手段,但也为日后窃取说的形成 埋下了种子。当袁氏称帝后,人们对其之攻击铺天盖 地,又联系到庄子的一句名言“窃国者诸侯”,使得 窃取说逐渐成形。后来,黄毅《袁氏窃国记》(1916 年,出版地不详)、陈伯达的《窃国大盗袁世凯》(群众 杂志社 1946 年版)以及建国后黎乃涵著《辛亥革命 与袁世凯》(三联书店 1950 年版)等仍持此论,为“窃 位”说奠定了基础。其中,陈伯达《窃国大盗袁世凯》 使得袁氏窃国大盗的形象妇孺皆知,尽管这并不是 严格的学术研究著作,只是一般性的历史知识读物, 但其影响之大而深远却令人瞠目。直到今天,尽管 窃取说在学术研究领域风光不再,但仍是坊间的闲 论及相关艺术的重要表现形式。窃取说当时能够大 行其道,根本上说仍是政治或阶级斗争的产物。

还位说别出心裁,无疑是为了纠正让位说。其 认为让位说既与历史事实不符,又存在着理论上的 缺陷,因为民国总统是民国公职、国家公器,非个人 所能让与的。所言确实很有道理。但是,在一定的 程度上,还位说自身也存有缺陷。从方法论上来说,

这是一种预设结论的先验性研究方法,其实质只是想证明孙中山不是让位而是还位这个结果,采用倒放历史的手法,且带有典型的后见之明,是以后来历史事实发展的结果重新反观历史发展过程而得出的结论,颠倒了历史发展的正常顺序。由于该说缺乏前瞻性的分析,很容易让人抓住把柄。因为按照其说所论,首先夸大了袁世凯的能力,有神化袁世凯的嫌疑;其次,很容易造成对辛亥革命的评价偏低,且有动摇辛亥革命伟大历史作用的嫌疑。尽管如此,还位说给让位说造成了很大的冲击,则是不容置疑的。

但不论让位说、窃取说还是还位说,都未能跳出孙中山中心观的藩篱。这不是说孙中山中心观不好(当然,孙中山的爱国意识、伟大形象永远值得我们大书特书),但它只是我们用来研究历史的一个视角,过于注重它,就必然忽视其余。再说辛亥革命是一个复杂、综合的重大历史事件,仅用一种研究方法,恐怕很难触摸历史的真相。

张宪文先生所倡的夺取上台说,对冲破孙中山中心观的束缚,无疑是向前迈出了重要的一步。他摈弃既往以很浓厚的感情色彩研究历史的方式,力求用一种全新的视角,重新实事求是地阐释这段历史,并且开始强调袁世凯的作用。这的确是值得称道的。但其不足之处在于立论略显单薄,并没有把袁世凯如何夺取政权的来龙去脉详细阐释清楚,只是得出一般性的结论。张代春用折衷的方法把孙中山的退位与袁世凯的上台巧妙地结合在一起<sup>[26]</sup>,无疑也是对此一问题深思熟虑的结果。

张华腾先生所倡的共建说,则颠覆了我们以往对辛亥革命结局的认识,把常被我们认为对立的双方——同盟会与北洋集团有机的统一起来,视角独到。就当时的历史演变来说,南北双方共同努力推翻清廷,显而易见。但张先生对此并没有仅仅停留在简单的结论上,而是以大量的事实论据为基础,论述周密,自成体系,令人信服。张先生对共建说的构建,不仅有利于重新认识这段历史,而且也把这一问题的研究推向了纵深方向。

以上诸说还有一个明显的倾向,即都未提及清室的因素。在辛亥革命结局的表述中,把清室因素忽视掉了是否科学,似乎还有待人们作进一步的思考。

#### 四 袁世凯对辛亥革命结局是如何认识的

很长一段时间以来,史学界根本不给予袁世凯话语权,袁世凯称帝是影响其话语权的根源,即使他所言是历史事实的真实反映,也必然被贴上狡诈的标签。而革命派一方的认知,不管正确与否,都可以当作论史的依据。这并不是历史研究者应持的正确立场,且有违研究者价值中立的原则。

既往的研究,目的是置袁世凯于不仁不义,并没有就他对这一时期历史演变的影响做较为深入的研究;且又对袁世凯采用双重价值评判标准,宁愿站在腐朽的也是以往被我们否定的清皇室的一边,也不愿站在袁世凯的一边,骂袁世凯对清室不忠。当袁接受共和时,我们却又不想革命党人兑现诺言;当革命党人兑现诺言、推荐袁世凯为临时大总统时,又骂袁为“窃国大盗”。结果,把本来鲜活的历史给主观化了。

其实,不管我们如何想,革命党人的主流倾向却是希望由袁世凯组织新的政府,而且是南北统一的政府。我们不仅因此而感叹:孙中山怎么没有建立一个统一的政府呢?甚至埋怨南京临时政府的失误就在“临时”二字上,这未免有些突发奇想而不顾当时的历史环境和条件。殊不知,孙氏何尝不想这样做呢?而事实上,困难要比我们后人想象的大得多。

袁世凯本人是如何看待他成为大总统的呢?这与我们固有的传统观念有很大不同。在南北议和后期,尽管袁世凯没有表露过心迹,但其对局势的发展无疑胸有成竹;再说,社会上“非袁莫属”的声浪在不断的扩大,已经有压过“非孙莫属”之势。所以,在得知孙中山推荐自己为临时大总统时,袁世凯表现得十分平静,不是欣喜若狂的应允,而是处心积虑地推却一番。尽管这是旧官场之套话,多少也给孙中山一些想象的空间:即袁某没有迫不及待地就任民国临时大总统的意图。袁世凯在致孙中山电中说:“惠电拜悉。慚悚万状,执事谦冲,莫名钦佩,但时艰方殷,万端待理,断非衰庸如凯者所堪胜任,倘不量而入,恐无以副国民付托之重及执事推荐之殷,切盼参议院另举贤能,使凯得徜徉山林,长作共和之国民,斯愿足矣,不尽下情,已托唐少川转达一切。”<sup>[27]</sup>当被南京临时参议院全票一致通过当选为临时大总统,并得到参议院及时电告:“昨孙大总统辞职,经本院承许,业已电知尊处。本日开临时大总统选举会,满场一致选定先生为临时大总统。查世界历史,选举大总统满场一致者,只华盛顿一人,公为再见,同

人深幸公为世界之第二华盛顿,我中华民国之第一华盛顿。”<sup>[28]</sup>之后,袁世凯的语气才多少有些缓和,表现出另一番模样。他在复孙中山电中说:“现在国体初定,隐患方多,凡在国民均应共效绵[绵]薄,惟自揣才力实难胜此重大之责任,兹更辱荷参议院正式选举。窃思公以伟略创始於前,而凯乃以轮材承乏於后,实深愧汗,凯之私愿始终以国利民福为归。当兹危急存亡之际,国民既以公义相责难,凯何敢不勉尽公仆义务。”<sup>[29]</sup>显然,袁世凯对孙中山的推贤让能有所保留,甚至并不认可,却独对参议院的公选情有独钟,因为他认为这是“躬乘我国民付托之重”<sup>[30]</sup>。由此可以看出,袁世凯对结局的认识仍是从长远打算的,既做到有理,也考虑到有利。

后来,袁世凯再回忆这一段历史时,又进一步指出辛亥政局演化结果之缘由。他认为:“然中华民国国体之更新,尚在约法未定以前,其缔造艰难得以至於今日者,固原於国民心理之所关,而实成于前清帝后之能让。溯自武昌首难月,惟辛亥中秋,其时本大总统激於救国救民之真诚,出而肩至艰至钜之重任,唯一宗旨以为,但能保前清皇室之尊荣,则国家不妨视为天下之公器,但能谋五大民族之乐利,则政治不妨改为民主共和,此本大总统於大清皇帝下诏退位之日,即披肝沥胆,以优待与宣布共和二事反复磋商,盖非徒效孤忠於故君,亦所以昭公信於民国,耿耿此心,我国民当能共谅。”<sup>[31]447</sup>从中不难看出,袁世凯首先强调的是“国民心理之所关”,其次是“前清帝后之能让”,然后才言自己的努力和革命派的磋商。事实上也正是如此,袁世凯始终把舆论的导向作为其政策的出发点<sup>[32]</sup>。起初,袁世凯坚持君主立宪为底线,唐绍仪南下议和时袁特意嘱托,而随着和谈的深入,革命党人毫不让步,且社会上掀起共和之风,再加上张謇、赵凤昌等立宪派的规劝,袁世凯逐渐有了动摇,最后毅然决然地顺从民众舆论。

袁世凯为什么强调“前清帝后之能让”?这是以往我们忽视的事实,传统观念认为清室是被打倒的,被打倒者还有什么价值可言。其实,持这种观点者,首先否定了民主共和确立过程中来自清室的阻力。实际上,当时这种阻力还是很大的,因为忠清的官僚在当时并非占少数,满洲贵族、蒙古王公就更不用说。张勋、赵尔巽等人,袁世凯是费了很大的力气游说,最后他们才勉强同意维持民主共和;陕甘的升允、长庚阳奉阴违,袁世凯也无可奈何;溥伟、铁良、

善耆等宗社党更与袁世凯势不两立。袁世凯不得已又向奕劻和隆裕太后寻求帮助,在他们的压制下,宗社党一时收敛嚣张气焰,但后来宗社党死灰复燃,还是给袁世凯制造了不少麻烦。再说,袁世凯重掌政权的合法性在哪里?这是悬在袁心中一个未决的问题,他十分害怕将来有人打着勤王的旗号来反对其统治,西方列强特别是日俄也有可能在这一问题上做文章。这种担忧并非多余,后来就发生了日本“愚弄北京的一些皇室贵族”,支持他们重新恢复政权的事情,这让袁世凯颇感棘手,不得不向英国寻求帮助<sup>[33]230</sup>。实际上,袁世凯之所以强调“前清帝后之能让”是有依据的,而不是信口胡说。在南北议和的后期,清室确也有倾向共和的举动,尽管这种表现多少有些被动,但至少也并未有与民主共和拼个鱼死网破的打算。清帝谕旨云:“何忍因一姓之尊荣,拂兆民之好恶。是用外观大势,内审舆情,特率皇帝将统治权公诸全国,定为共和立宪国体,近慰海内厌乱望治之心,远协古圣天下为公之义。”<sup>[34]72</sup>其实,话说白了,在袁世凯看来,没有清室的退位,南北议和很难成功,其也很难当选临时大总统。而事实是袁世凯当上了民国大总统,反观过去,他怎会不感慨!

袁世凯所言是否符合事实,我们以后见之明观之,也很难认为他是错的。再说历史的结论也得考虑到历史人物本人是怎么认识的,不管这种认识正确与否,那是他自己对这一问题的解答,他的认识和解释对这一问题的研究显然有很重要的影响。如果不考虑这一点,对袁世凯是如何成为临时大总统的探讨,就多多少少会失去历史的真实性。

以往我们把辛亥革命中的袁世凯鬼化的同时也给予神化了,其几乎无所不能,时势的发展也无不以其意志为转移,想什么有什么,要什么,什么就来了。这样一位神通广大的人,一面玩弄孤儿寡母於股掌之中,一面要挟革命党人,两面得利。他还需要别人让位吗?恐怕不需要。既然如此,我们的研究就有问题。问题出在哪里,这需要我们重新审视这段历史,是抓偏了,还是无意中剪裁了历史。首先,我们必须把袁世凯作为一个重要的人物来看待,他之所以更胜一筹,不是他的魔力大,而是他善于静观时变,善于把握历史的关节点,不违民意,更不一意孤行。其次,袁世凯所为仅仅是为了自己,还是为了整个中华民族?以往我们认为袁世凯仅知道擅权,不及其余,而就其当时的行动而言,这种说法不无片面

性。因为袁氏之所言所行,一是为了避免国内大乱,二是为了防止外国干涉,三是为政治改良积极努力,四是他并没有愚忠,而是主动地顺应历史发展的潮流。

从后来历史发展的脉络来看,革命党人最终交权,这与其自身的力量、内部矛盾、外部压力等等分不开,说胳膊拧不过大腿一点没错。历史往往很残酷,但并非不公正,衡量公正的重要砝码就是实力和势力的综合体能。在辛亥革命的过程中,由于袁氏的这种综合体能远超过革命派的综合体能,袁世凯的胜出顺理成章。我们后人研究历史,对此不无感叹,甚至感到遗憾,继而向历史人物袁世凯发泄怨气,这种心情可以理解,但总不能把这种思想感情作为治史的出发点。否则,我们只能打着治史的旗号,并不能完成还原历史的任务,因为我们违背了价值中立这一治史原则。

就当时而言,骂袁世凯最多的是革命党人,清室亲贵倒还在其次,拥袁呼声最高的仍然是革命党人,这似乎是一个悖论。而实际上,这个悖论后面隐藏着这样一个事实:不管你喜不喜欢,乐不乐意,袁世凯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无可替代。这并非夸张,如果你深入到史料中去,翻阅一下当时的报刊杂志,你便不会感到诧异。所以,最终袁世凯当选民国大

总统,取孙中山而代之,自然便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既往我们对袁世凯的评鉴,大多并非是建立在历史的、客观的、真实的材料分析基础之上的,往往臆断,随意的猜测,我们大有不把袁世凯完全否定而不罢休的意思。说他不仁不义,说他欺上罔下,用一些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来论证,这恐怕都不符合历史研究的常态。袁世凯究竟如何,应该用事实说话。

如今,可喜的是,随着思想的进一步解放,对袁世凯的研究逐渐受到了重视,由一概骂倒,逐渐回归到理性的分析上来,史学研究的方法手段也进一步突破,如现代化史观,综合史学方法的运用等等。袁世凯的作用,也逐渐得到认可。一些学者指出应该肯定袁世凯在辛亥革命中的作用,认为对袁世凯应理直气壮、实事求是地给予肯定,不必遮遮掩掩<sup>⑤</sup>。在强大的主流史观——反袁世凯史学观笼罩下,提出这样的观点,无疑让人眼前一亮,但终究因各种因素的制约,这样的观点只是昙花一现,并没有掀起更多的波澜,反倒掀起一股反对为袁世凯“翻案”的潮流。

关于辛亥革命中袁世凯的研究,总体而言做得仍不够,步子仍未完全放开,仍有进一步深入研究之必要,相信随着思想的进一步解放,将来辛亥革命及袁世凯研究必将进入一个全新的阶段。

#### 注释:

- ① 比如关于辛亥革命的善后问题,特别是对赔偿外国损失方面,至今尚未有人作专文论述,不能说不是一大遗憾。但查1912—1916年《申报》对此关注颇多,其中既有对索赔数额的描述,也有对北京政府立场的转变及前后民众态度异同的关注,且在直接赔款和间接赔款一事上与法国的矛盾最深等等的报道,不一而足。由此观之,其在当时的影响应该说还是蛮大的,理应成为我们研究的视野所在。
- ② 袁世凯当选临时大总统后,不论先前爱他的,还是恨他的概发贺电,并对其歌功颂德。参见《临时公报》辛亥十二月二十九至壬子年正月初十日之电报。
- ③ 陈一容、张国镛《孙中山“还位”辩证》,《史学月刊》1997年第3期;陈一容《孙中山民元“让位”问题再认识》,《西南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3期。
- ④ 参见陈旭麓《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337页;《郭世佑就辛亥革命史研究如何深入等问题答记者问》,《社会科学报》1991年11月28日;常宗虎《试论袁世凯取得临时大总统职位的是非》,《人文杂志》1992年第1期;朱钟颐《评袁世凯“窃取政权”》,《湖南教育学院学报》1994年第6期;郭世佑《辛亥革命的历史条件与历史结局再认识》,《清史研究》1995年第3期等。
- ⑤ 参见季云飞《论袁世凯在辛亥革命中的作用》,《学术月刊》1989年第4期;姜新《重评辛亥革命前期的袁世凯》,《徐州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2年第4期;郭剑林《关于袁世凯评价的几个问题》,《河北学刊》1994年第6期;谢俊美《袁世凯成败简论》,《历史教学》2004年第10期等。

#### 参考文献:

- [1]毛泽东选集(合订本)[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4.



- [2]史晓风. 恽毓鼎澄斋日记:第二册[M]. 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4.
- [3]张海鹏. 二十世纪的中国·政坛风云卷[M]. 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99.
- [4]侯宜杰. 二十世纪初中国政治改革风潮[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 [5]张华腾. 北洋军阀词语探源——简论北洋军阀、北洋集团概念的使用[J]. 史林,2008,(3):81-86.
- [6]刘伟. 晚清督抚政治——中央与地方关系研究[M]. 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3.
- [7]陈旭麓. 军阀与近代中国社会[C]//西南军阀史研究会. 西南军阀史研究丛刊:第二辑. 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83.
- [8]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 国父全集:第4册[M]. 台北:台湾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73.
- [9]罗重实. 新桂系李宗仁在玉林发家浅论[C]//西南军阀史研究会. 西南军阀史研究丛刊:第三辑. 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85.
- [10]倪俊明. 龙济光在粤军阀统治述略[C]//西南军阀史研究会. 西南军阀史研究丛刊:第三辑. 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85.
- [11]李宗仁. 李宗仁回忆录:上[M]. 南宁: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
- [12]冯祖贻. 辛亥革命与近代军阀统治的产生[C]//西南军阀史研究会. 西南军阀史研究丛刊:第二辑. 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83.
- [13]丁健. 民元孙中山让位的共赢性[J]. 哈尔滨学院学报,2007,(12):111-115.
- [14]张宪文. 中华民国史纲[M]. 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5.
- [15]张华腾. 对立中的统一:辛亥革命前后同盟会、北洋集团关系述论[J]. 江海学刊,2006,(1):165-171.
- [16]本馆接孙君逸仙自巴黎来电[N]. 民立报,1912-11-17.
- [17]致袁世凯电[M]//孙中山全集:第一卷. 北京:中华书局,1981.
- [18]致袁世凯电[M]//孙中山全集:第二卷. 北京:中华书局,1982.
- [19]西报之时局谈[N]. 申报,1912-01-18(3).
- [20]临时大总统咨参议院推荐袁世凯文[J]. 临时政府公报,1912,(17).
- [21]电报[N]. 临时公报,1912-02-18.
- [22]致邓泽如函二件[M]//孙中山全集:第三卷. 北京:中华书局,1982.
- [23]纪京友之言[N]. 申报,1912-01-14(3).
- [24]清谈[N]. 申报,1912-02-08(3).
- [25]讨袁世凯(二)[N]. 民立报,1911-11-26.
- [26]张代春. 也谈孙中山退位与袁世凯上台问题[J]. 史学月刊,2006,(10):124-126.
- [27]电报[N]. 临时公报,1912-02-16.
- [28]电报[N]. 临时公报,1912-02-17.
- [29]电报[N]. 临时公报,1912-02-18.
- [30]命令[N]. 政府公报,1913-01-11.
- [31]沈云龙. 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十九辑[G]. 台北:台湾文海出版社,1966.
- [32]丁健. 袁世凯获选临时大总统历史原因新论[J]. 武汉科技大学学报(社科版),2010,(3):79-83.
- [33]章开沅,罗福惠,严昌洪. 辛亥革命史资料新编:第八卷[G]. 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6.
- [34]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 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二辑[G].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81.

[责任编辑:凌兴珍]